

同时也很有效,所以南宋吕祖谦《吕氏家塾读诗记》序说:“河南程氏、横渠张氏始用己意有所发明,虽其浅、深、得、失有不能同,然自是之后,三百五篇之微词奥义乃可得而寻绎,盖不待讲于齐鲁韩氏之传而学者也,知诗之不专于毛郑矣。”元代梁益《诗传旁通》下卷一五说:“至宋而欧阳氏、苏氏始撤其藩,睹其堂室;明道氏、伊川氏、横渠氏发其藪,启其钥,诗之真隐而复豁。”对张载解经方式意义的评价是很充分的。可以说,张载的解诗方法对宋、明《诗经》学的影响极为深刻,形成了一种潮流,是宋学精神的一种体现。

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就会发现,张载不仅仅提倡解《诗经》须“置心平易”,解其他书皆然。他说:“诗全是

人之情性,须先得诗人之心,然后观玩易入,凡书皆然。大抵圣人语言尽由德性中出,故须先得其心,则咏其言易以入也。”(《吕氏家塾读诗记》卷一)就是“观书必总其言而求作者之意。”(《张载集》,第275页)这“总其言”的意思就是要把书中义理总结出来,而不是仅仅词解句释,最终目的是“求作者之意”。这样,“置心平易”、“总其言”、“求作者之意”就上升为一种普遍的解经方法。

总之,“张横渠体”的出现在文学上和经学上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,为宋学精神的创立、发展提供了方法论和范例。

[作者单位:河南教育学院中文系]

文天祥与江万里兄弟交游考

尹 波

有宋一代,凡师生皆为丞相,而在抗元斗争中均捐躯者,只有南宋的文天祥和他的老师江万里。一个在元大都柴市口英勇就义,一个在饶州“止水”赴难,其铮傲骨,民族气节,“留取丹心照汗青”、“吾与国为存亡”,皆永垂于青史。元刘壎有云:“盖近年进士为宰相,能守节作全人者二人焉:浩然清流而不污者,公也(指江万里);毅然朔庭而不屈者,文山公也。”(《水云村稿》卷七《题古文后》)

文天祥(1236—1283),字宋瑞,一字履善,号文山,庐陵(今江西吉安)人。宝祐四年(1256)状元。判宁海军,守瑞州,权学士院。咸淳九年(1273)为湖南提刑,明年改知赣州。德祐初(1275)勤王抗元,次年,任右丞相兼枢密使。祥兴元年(1278)被俘,囚禁三年,编《指南录》,作《正气歌》,至元十九年末(1283年1月)死难(1282)。著有《文山先生全集》,其诗气势豪放,堪称诗史。江万里(1198—1275),字子远,号古心,又称庐山公,都昌(今江西都昌)人。宝庆二年(1226)进士。历池州教授、试馆职,知吉州、隆兴府,改侍御史,迁刑部侍郎、国子祭酒,知枢密院事、参知政事,寻知潭州、湖南安抚大使。德祐元年于饶州“止水”死难(1275)。

加赠太师、谥文忠。江万里弟江万顷(1211—1275),字子洪,一字子玉,号古崖。任提领犒赏酒库所主管文字,出守临江军,提举福建市舶,又知瑞安、吉州、南剑州等,亦在饶州城破时为元兵执捕,“大骂不屈”,被肢解而死。

一 “某在门墙诸孙辈行中”

庐陵,是“江南望郡”和“文章节义之邦”,是人文荟萃之地,仅在宋代,就产生了“四忠一节”(文忠欧阳修,忠襄杨邦义,忠简胡铨,文忠周必大,文节杨万里),报国尽忠风气甚盛。江万里少时,“父师窃窃传习朱氏,处白鹿,游东湖,所交多考亭门人”(刘辰翁《须溪集》卷三《鹭洲书院江文忠公祠堂记》)。淳祐元年,江万里首次知吉州,以其承接于朱熹之思想来“教庠序士”(袁甫《蒙斋集》卷一七《江夫人巢氏墓志铭》),而其规章制度,建筑等,亦仿白鹿洞书院例,在吉州城东白鹭洲创白鹭洲书院。因其“好士似欧公,论谏似欧公,变文体似欧公”,而“声名德业,高迈前闻,故能创鹭洲如白鹿”(《须溪集》卷三《鹭洲书院江文忠公祠堂记》),宋理宗曾赐御“白鹭洲书院”匾额。万里知吉州时,收门客李叔端、欧阳守道,特别是云岩先生李公叔端,“为丞相、益国、古心先生江

文忠公之客几四十年”，忠心不二，“使古心公平生宾客何限，独不忘吾庐陵，自谓若有缘者”（刘将孙《养吾斋集》卷二六《古心与云岩书简跋》），甚至于“至庐陵梦耳！”所以刘辰翁评价道：“其志念在国家，其精神在庐陵。”

文天祥亦深受地域文化的影响。宝祐三年二十岁时，入欧阳守道主持的白鹭洲书院攻读，“事先生如执经”（文天祥《文山先生全集》卷一一《祭欧阳巽斋先生》，下引该书只注卷、篇）。而守道为万里门人，故文天祥在咸淳九年《通潭州安抚大使江丞相》中云：“某在门墙诸孙辈行中，而所以蒙钧天造就，知爱绸缪，独出乎诸生之右。然号为登门，垂二十年，而至今庭下无愈之迹。古人负笈从师，不问道路之远，某乃不能自拔如此，殆不可对人言也。”（卷五）则天祥慕江万里之名，在万里创建的白鹭洲书院中，师从欧阳守道，“求为有益于世用，而不为高谈虚语以自标榜于一时”（卷一一《祭欧阳巽斋先生》）。可见，万里及门人欧阳守道的思想、道德、人品，对青年时代的文天祥产生了良好、深远的影响，造就了宝祐四年吉州历史上的第一个状元文天祥。宝祐五年九月，文天祥丁父忧，亦请江万里为其父撰墓志铭。从此以后，文天祥随江万里的升降而在宦海中浮沉，在抗元中奋战。

二 “步亦步而趋亦趋”

景定二年“夏五之月”，文天祥适主管建昌军仙都观，自“草野”上《贺签书枢密江端明古心书》一：“伏从下土，切听朝命，共惟天子搜选洪儒，布满侍从，而先生以海内达尊，居然冠文昌之首。”又云：“先生都范（范仲淹）、马（司马光）之望于一身……关系于方来之世道，诚重且大……将范、马不及为之事，先生将来虽欲逃之而不为，岂以何辞以谢天地神人之所期哉！”（卷六）其年八月，江万里自通奉大夫、守吏部尚书除端明殿学士、同签书枢密院事。八月的任命，文天祥在五月就知悉。因为江万里曾经犹豫是否接受任命，并以此征询文天祥的意见。由此可见江万里对文天祥的信任。文天祥则以“天下之公”期于江万里，为国为民之心，跃然纸上。

十月三日，因江万里“提撕荐进”，任命文天祥为秘书省正字。天祥上书宋理宗《辞免新除秘书省正字状》云：“令某满足官观两考日，祇被新命。”（卷四）十一月，与江万里书，重申“欲俟官观两考妣满日，徐拜恩渥”（卷六《贺签书枢密江端明古心》二）。又《谢江枢密万里》“门墙之隆遇……某敢不力持素节，勉企前修？”（卷七）

咸淳二年正月，“江万里四请归田，乞祠禄”（《宋史》

卷四六《度宗纪》，中华书局1977年版，第3册，第895页），返居饶州。文天祥自家乡修书《通江参政古心》，并遣“专人上状”，书中有“司马居洛，而相天子，活百姓，都人西其首而望”之语（卷五）。又谈及“某屏伏田野，蒙赖钧天之庇，守先人坟墓……追惟两年间，口语横出”，即指咸淳元年任瑞州提刑时，因其父文仪生母歿，申解官承心制，以台臣论罢。在书中，天祥赞万里“进而庙堂，退而江湖，德于其人，如出一日，《传》所谓生死骨肉之情也”。在文天祥看来，江万里不仅是自己的老师和引路人，甚至有“生死骨肉之情”。

四月，文天祥曾追忆“今丞相江公万里”（卷一一《知韶州刘客斋墓志铭》）淳祐四年或五年荐举刘元刚，使得以在“五年班见”。既云“今丞相”，说明江万里咸淳二年四月间尚未“予祠”，此可补《宋史·江万里传》之缺。

咸淳五年正月，江万里由知太平州拜参知政事，三月，进左丞相兼枢密使。文天祥在文山《贺江左相》：“某猥在山栖，欣逢庭册，亲见上下云龙之会，岂徒门栏燕雀之私。”（卷七）四月，因江万里荐，起知宁国府，十一月到任，将“极雕弊”的宁国府“爬梳条理”得“旷然无事”。在府逾月，去后，百姓为他立生祠。

夏，刘辰翁丁母忧，由中书省架阁返乡，并寄江万里为其母所撰墓志铭给文天祥。天祥回函云：“某伏蒙专札，重示先夫人志铭，伏读惊怆靡已。古心先生藻发清言，垂光罔极，慈灵有知，含笑地下。此可以无愧人子矣。”（卷五《回刘架阁会孟》）

咸淳八年初，文天祥《与知吉州江提举万顷》书三云：“大丞相古心老师，某不敢容易上问钧履，丐为转道，詹依卷卷。”说明文天祥对江万里的眷恋、关心无处不在。

咸淳八年末，文天祥自文山上《贺前人正》，有云“某喜逢鸡朔”之语（卷七）。按咸淳九年为鸡年，故据此系于八年。又因江万里除湖南安抚大使、判潭州，天祥遂上《贺江丞相除湖南安抚大使判潭州》；万里旋加特进，天祥复上《贺前人除特进》启。因江万里致礼，天祥再上《回前人除特进送礼》（均见卷七）。文天祥咸淳九年正月除湖南提刑，当是江万里同意知潭州后的提名。若以明档送达，以驿程推之，其发出当在八年末。《宋史·江万里传》云“授知潭州、湖南安抚大使，加特进，寻予祠。时咸淳九年，万里年七十有六矣”有误，江万里“予祠”也在咸淳十年正月，见《宋史》卷四六《度宗纪》。

咸淳九年三月，文天祥领湖南提刑事。“四月八日辞膝下，留庐陵城中”，闻江万里九日在赴潭州途中于清江

拜度宗生日乾会节，“亟亟追逐牙纛，度宜春、醴陵间，所蹉跎片云间耳”，于是“兹专布状，重谢不敏，且致恭先之悃”。并告之“盖驰驱数旬，又须乞便郡归养耳”（卷五《通潭州安抚大使江丞相》）。“夏五月”到任，首“见古心先生江公万里于长沙。公从容语及国事，惘然曰：‘吾老矣！观天时人事，当有变。吾阅人多矣，世道之责，其在君乎！’”（卷一七《纪年录》）寄宋朝振兴之望于天祥。拜见后，江万里又为之设宴，“晓醉长沙”，天祥谢之，有“肃拜初筵”之语（卷七《行部潭州谢江丞相宴》）。相字原无，据线装书局2004年《宋集珍本丛刊》影印明景泰刻本《文山先生全集·目录》补。九月重阳节，复又聚会、赋诗、观花、赏马，天祥为撰《送前人九日礼》、《回前人送九日礼》（卷七）。十月二十七日，江万里生日，天祥《寿古心江先生》云：“古心江先生以旧弼出镇长沙，癸酉十月乙亥，是为七十六岁。门人文某以一节趋走部内，谨拟古体一首为寿。”（卷二。按：从文天祥所云“癸酉十月乙亥，是为七十六岁”之语，可知咸淳九年十月江万里七十六岁。是月己酉朔，乙亥正是二十七日，则可知江万里出生于庆元四年十月二十七日）并“介寿酒于公堂”（卷七《送前人酒》）。十一月十三日至二十九日，文天祥以提刑节制司名义向安抚司上平寇循环历五则，万里以大使司名义回札五则，连同之前所上的《与湖南大帅江丞相论秦寇事宜札子》，皆谈及平定秦孟西之策（俱见《文山集》卷一二）。冬至，天祥复上万里《贺前人冬》、《送前人折筵》、《回前人送冬酒》诸启（卷七）。

咸淳十年正月，“江万里以疾辞旧任，诏依旧观文殿大学士提举洞霄宫”（《宋史》卷四六《度宗纪》，第917页），返归饶州，文天祥则因“（去）冬，乞便郡侍亲，差知赣州”，于“孟春之二十五日，发舟石鼓，越三日，过衡山”（卷九《五色赋记》），故文天祥云：“先生之入湘也，某后三数日而来；先生之出湘也，某后三数日而去。何其步亦步而趋亦趋也？”（卷六《与前人，时以前宰相帅湖南回》）可见江万里、文天祥在咸淳十年正月二十五日之前均已离开潭州。江万里离开潭州后，路过临江，天祥嘱弟文璧“于临江候迓使舡，独蒙一再予进，所以爱之海之，不令兄弟无间然者”（卷六《与前人，时以前宰相帅湖南回》）。

咸淳十年三月，文天祥到赣州任。春末夏初，《回前人送春》，恨“莫陪左相之杯”（卷七）。十月，又《与前人，时以前宰相帅湖南回》书，告知赣州风调雨顺，秦孟西之变已平，感谢江万里“一再予进”（卷六）。

三 与江万顷的交游

文天祥不仅与江万里相知，与其弟江万顷也颇多来往。特别是咸淳六年至八年江万顷知吉州时，文天祥也于咸淳六年七月罢秘书少监职，返回吉州。从《文山先生全集》卷五可知，文天祥三次《与知吉州江提举万顷》书，陈赈济之策，颂新年之好，道“怅惋如失”之思。康熙十三年《江氏大成宗谱》卷一所载江万顷子江鉴撰《古崖先生圻中记》一文，云：“知吉州……抚古心先生三十年棠荫之旧，延见吏民，靡不欢欣，谓故侯江公之介弟，何其兄之酷似也。未几，兼江西仓……除仓部郎官提举江西仓，兼知吉州。”江万里嘉熙四年知吉州，而“三十年棠荫之旧”正是江万顷咸淳六年知吉州之时。从江万顷秋季以“公札下问劝分”可知，江万顷任职当在秋季之前。

文天祥《与知吉州江提举万顷》书一云：“某两年乎山中……明公以洞庭五老之胸，时雨一路，曾未数月，春旗霜艘，风采轩豁，所谓动摇山岳，细事耳。少须暇之，棣萼棠阴，先后浓郁，梦寐五采，衣被八紘。持国弟兄盛事，再见大江以西之父老弟子，岂得以私我公哉……岁将新矣，愿言满颂盘椒，对扬绁绿。”按，文天祥咸淳六年罢官回庐陵，“两年乎山中”、“岁将新矣”，说明此信作于咸淳七年末。信中还追记了万里知吉州后三十年，万顷“再见大江以西之父老弟子”，可见万顷咸淳七年末尚在吉州任上。

万顷到吉州任后，因咸淳六年秋庐陵半亏，以“公札下问劝分”，故文天祥在《与知吉州江提举万顷》书二中曰：“某伏蒙公札，下问劝分，仰见豈弟父母救民水火之盛心。”向江万顷“陆续申控”了不少赈济之策：建议万顷以使司名义与龙泉、永新，“斟酌放行”“运糴者”；并与李雷应通书，许人赴赣收糴：“近同年李守惠书，自谓年谷中熟，米价日低。某尝答书之：‘庐陵一歉，异于常年，田里憔悴，不堪举目。惟章贡素无糴事，而得岁又偏，乡人颠顿者，往往相率而趋。治国民食关系，苟可通融兼爱，秦晋公之惠也。’盖赣浮桥，泄米之令素严，田吉号产米，而赣多山少田，故为赣计，不容旁及邻邦。今岁事既相反，又当通变，此须古崖一书，与李守通情，俟得其要领，然后大榜境内，许人赴赣收糴，此亦权宜之一策也。”按李守雷应咸淳六年被旨知赣州，“七月下车，膏雨霑流，嘉气坱集，民声大和，四郊以宁……明年四月，侯除荆湖南路提点刑狱”（卷九《赣州重修嘉济庙记》），

说明文天祥答李雷应“庐陵一歉”书在咸淳六年秋收之后，而与江万顷书二又有“今年晚稻半亏，颗粒并是入官之数，早稻不过二三分，则是民食十减七八，此其所以皇皇也”之语，又说明了文天祥《与知吉州江提举万顷》书二作于《回贛守李宗丞雷应》“庐陵一歉”（卷六）之后，亦即咸淳六年秋收之后。于此可见文天祥热爱家乡之心，又说明《文山先生全集》卷五所收《与知吉州江提举万顷》二应置于与江万顷首篇，今所见文天祥集最早之明景泰刻本编选时倒置，以后均延续其误。

文天祥《与知吉州江提举万顷》书三曰：“某受廛两年，当使君之行，不得往送，诗又不达，歉负为何如。亟亟无诗，并拜此纸，从新昌壁弟处，借一兵走诣潭府，不知紫燕在芝山，或在庐山邪？”文天祥既然“受廛两年”，说明江万顷知吉州时也只有二年时间就被罢免了。文天祥与江万顷书一作于咸淳七年末，则书三之作，从“初十日，始得初八日申时宝翰，则知去期甚速”之语来看，说明万顷八年初即离职了。从信中“去期甚速”、“抖擞作诗，意必可相及”、“解维已三日”之语来看，江万顷离职时很快，以至于文天祥“抖擞作诗”、“诗又不达”，所以文天祥才有“歉负为何如”之说，也才有专借一兵“走诣潭府”，只是不知江万顷是在芝山还是在庐山罢了。据此可见文天祥与江万顷书三作于咸淳八年初。

文天祥对江万顷知吉州二年给了很高的评价，他说：“庐陵四境皇皇，流离入贛，过吾乡者无虚日。岂弟父母，又拂衣去之，细民嗷嗷，皆谓曷不留我公，抚我妻儿妇女，一无异辞。此即公论在人心，不可磨灭处。吾辈仕宦得如此，即无愧《汉·循吏传》，浮云得丧，何足较也。”

咸淳八年，文天祥为江万顷“一丘”书扁“复庵”。《古崖先生圻中记》有云：“晚年预营一丘于所居之里，团山之原，宫其下，曰复庵，盖取老子观复之说。巽斋欧阳公守道为之记，文山文公天祥书其扁。”江万顷咸淳八年从吉州任上“免归，仍祠云台。岁余复起家，知南剑州……不俟命，归隐于家”（康熙十三年《江氏大成宗谱》卷一《古崖先生圻中记》）。可见万顷咸淳九年间除短暂知南剑州外，皆居于饶州芝山。欧阳守道卒于咸淳九年正月，则天祥书扁定在此前，是当书于咸淳八年。

四 共赴国难

文天祥不仅在思想上和江万里保持一致，而且在行动上，特别是在抵抗元军入侵、杀身成仁、舍生取义方面，更是惊人的一致。

咸淳九年二月，“万里闻襄樊失守，凿池芝山后圃，扁其亭曰‘止水’。人莫谕其意”（《宋史》卷四一八《江万里传》，第12525页）。德祐元年二月二十一日，江万里“居饶州，虏入城，先生投府第中池水（即止水）死。其弟万顷于厅事上被执杀死”（卷一六《集杜诗》）。死前曰：“大势不可支，余虽不在位，当与国为存亡。”（《宋史》卷四一八《江万里传》，第12525页）止水，出自于程、朱“所谓‘圣人之心如明镜止水’……存者，道心也；亡者，人心也”（郭齐、尹波点校《朱熹集》卷四〇《答何叔京》“心说已喻”条，四川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，第1884页）。天道长存而人心已亡，可见江万里已抱定了“与国为存亡”而止于水的想法。平静的水是安详的、没有波浪的，江万里“止水”之后，则掀起了惊天大浪——文天祥，即是：止水本无波，止水复生波。文天祥被俘后，至元十七年在所撰《集杜诗》、《纪年录》中，忆及江万里“公家番禺，城陷，义不辱，自沉而死。予洒血攘袂，颠沛驱驰，卒以孤军陷没，无益于天下。追念公言，辄为流涕”（卷一七《纪年录》），又作文哀祭：“星折台衡地，斯文去矣休。湖光与天远，屈注沧江流。”（卷一六《集杜诗》）其隆情厚谊，让人可叹！而亦效万里例，写下了“人生自古谁无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”的名篇，拒绝了元世祖“百计训之”的高官、美女、钱财、亲情等各种诱惑，在元大都和元世祖斗争三年之后，抱定“宋亡，惟可死，不可生”，“一死之外，无可为者”的信念，将“绝笔”“赞”书于衣带间：“孔曰成仁，孟曰取义。惟其义尽，所以仁至。读圣贤书，所学何事。而今而后，庶几无愧。”留下了三首绝命诗，于至元十九年十二月九日，即江万里死难后八年，从容就义，实现了“忠胆义肝不可状，要与人间留好样”（卷二〇汪水云《浮丘道人招魂歌》）的夙愿。师生两个共同谱写了一曲荡气回肠的民族之歌、爱国之歌，直到永远。

[作者单位：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]